

DOI: 10.3969/j.issn.1004-390X(s).202005026

# 近代中国社会关注与思考乡村问题的特点及启示

蔡胜, 张寅

(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2)

**摘要:** 近代中国社会对乡村问题进行了高度地关注和深入地思考, 并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站位高, 着眼于民族复兴的高度; 跳出“三农”论“三农”, 具有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视野; 立足乡情国情, 进行广泛乡村调查; 多元力量协调合作, 致力乡村建设。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关注与思考乡村问题的特点无疑有其现实意义, 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关键词:** 近代中国; 乡村问题;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 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2021)01-0154-07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Society Concerning and Thinking about Rural Issues in Modern China

CAI Sheng, ZHAGN Yi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China)

**Abstract:** The society has carried on the high attention and the deep thought to the rural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four main aspects: the society thinks deeply about the rural questions, focus on the leve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t is not limited to the thought of “three rural issues” to discuss “three rural issues”, have the vis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o conduct an extensive rural survey on the premise of rural national conditions; multi-forc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committed to rural construction. It is also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in modern China society concerning and thinking about rural issues,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modern China; rural issues; rural revitalization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sup>[1]</sup>。中共中央、国务院也从 2004 年至今连续 17 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三农”问题既是一个新问题, 同时也是个老问题。近代以来, 中国乡村在各方面的加剧冲击下, 乡村危机凸显, 与此同时,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乡村问题, 乡村建设风起云涌。学界围绕

乡村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众多, 但从关注与思考特点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则并不多见<sup>[2]</sup>。探寻近代社会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汲取智慧, 能为今天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的历史启示。

### 一、着眼于民族复兴高度关注乡村问题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 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政策, 关注的重心是粮食的丰足和乡村的稳定, 目的是实现封建政权的稳固。

收稿日期: 2020-05-12   修回日期: 2020-06-09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权力·性别·文化: 近代皖北社会与女性婚姻生活困境”(AHSKQ2015D74)。

作者简介: 蔡胜(1981—), 男, 安徽潜山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三农”问题研究。

到了近代,乡村问题关注主体和关注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农业发展、农民困苦和乡村凋敝等问题,并且立足于民族复兴高度关注乡村问题,将乡村问题与新的时代课题紧密结合起来。

(一) 重建新文化中将乡村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寻求着救国救民的良方,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中,“东西文化”“新旧问题”成为舆论界关注的焦点,探讨着东西文明优劣异同等问题。“五四”运动以后,如何建设新文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农民”的价值发现促使知识精英“觉悟”到重建新文化必须立足于乡村,从文化角度将乡村建设和民族复兴紧密结合起来。

鲁迅从乡村找寻救国方向,小说《祝福》就将农村和农民带到大众面前,通过破除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解放农民思想,寻找救中国之路<sup>[3]</sup>。李大钊强调“中华民族之复活”依靠十月革命后俄国新出现的“第三新文明”,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呼吁青年到农村去,“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sup>[4]</sup>。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在于文化失调,强调从文化改造入手,通过新礼俗、乡农学校重建新组织,从而复兴传统文化达到“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顾名思义,“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sup>[5]</sup><sup>19</sup>。

(二) 乡村危机日益加重中将乡村问题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

随着乡村危机的日益加重,社会各界普遍认为,乡村问题不仅仅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而且关系到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乡村表现出全面性危机,经济衰退、政权劣化、教育缺乏、社会失序。“乡村崩溃”“农业恐慌”成为热门词语,“现在报馆里排字的工人,一见‘农村’就有急找‘破产’两个字的暗示”<sup>[6]</sup>。而农村对于中国而言异常重要,陈醉云称之为“中国的命脉”,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生活于农村。都市的繁荣与存在,固依赖于农村;既地方税收的大部分,

也仍取给于田赋<sup>[7]</sup>。《东方杂志》编辑也认为,中国是三万万余万劳苦农民所集成的国家,中国生活的重心,应立在于农村而不在于都市<sup>[8]</sup>。面对乡村困境,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思考乡村问题。正如时人所说,“现在所谓农村复兴的呼声,亦算是高唱入云了,政府当局,专门学者,大学教授,新闻记者,普通文人,那一个没有几篇关于复兴农村的大作”<sup>[9]</sup>。

媒体紧扣时代思潮,《乡村建设》《中国农村》等乡村类期刊纷纷创办,各类综合性报刊也纷纷开辟乡村问题研究专号或专栏。各专业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切入思考乡村问题及寻求解决对策,文学家描述了农民的困苦和乡村的凋敝,农学家强调农业技术提升,人口学者关注乡村人口是否过剩,合作学者探讨农业合作,地政学派关注土地问题等等。

国民政府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直属于行政院,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任委员长,统领乡村各项建设。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sup>[10]</sup>,而且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带领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乡村建设者分别从文化、教育和经济等方面着手进行乡村建设,解决“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等问题,从而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sup>[11]</sup>。

各种思想和实践虽言人人殊,但殊途同归,都视乡村问题为“中国的根本问题”<sup>[12]</sup>,乡村危机,即是乡村之“危”,也是民族之“机”。时人将民族复兴与振兴乡村相衔接,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复兴农村便是复兴民族之基石,我中华民族之存亡关头,迫于眉睫矣。然农村为中华民族之命脉,惟复兴农村,方能复兴民族,欲复兴民族,必先复兴农村<sup>[13]</sup>。

## 二、贯穿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视野中探索乡村问题

传统中国乡村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灾荒和乡村社会不稳定等问题,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日益加深,近代国人紧扣时代特征,不同于传统乡村问题认知思路,开始跳出“三农”论“三农”,将乡村问题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把握乡村问题的时代特点和规律,探寻解决方案。

(一) 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视角思考乡村衰败原因

乡村衰败具有历史必然性,乡村衰落是世界普遍性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指出,世界各国农村经济之衰落,为农业革命以来之普遍过程<sup>[14]</sup>。社会学家孙本文认为,“离村运动”在欧美各国都存在,各国都市化的趋向,有进无退,故农村人口或农业人口所占百分比,势必日见减低<sup>[15]</sup>。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演进,农业的没落和乡村的凋敝日益凸显,国人对此有清醒的认知,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没落,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因工业化结果,农村副业大都被机器工业剥夺,而昔日大家庭及乡村团体,赖副业及自给自足生产以生存者,举不能维持<sup>[16]</sup>。《东方杂志》编辑感叹农民的痛苦,农业的中国已开始入于工商业化的时代,于是农民的困苦比从前更甚,要受到三重的剥削:第一,是外国工业资本的剥削;第二,是本国工业资本的剥削;第三,是城市及乡村大商小商及一切仲卖者的剥削<sup>[17]</sup>。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促使了农村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古代的中国,城市只在很少几方面有别于农村<sup>[18]</sup>,但在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在教育、收入、就业、公共设施等各方面迅速拉开差距,人才、资金等资源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杨开道指出,农村的人口和资本,被都市的工商业所吸收了;农村的领袖,被都市的机关所引用了<sup>[19]</sup>。时人评价道:中国的整个都市化,是牺牲农村,是吮吸农村的脂膏骨髓来滋养都市<sup>[20]</sup>。

全球化的进程也加速了中国农村的衰败,特别是此时中国又遇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中国乡村衰败还具有新的时代特性,“谷贱伤农”“丰收成灾”“农业恐慌”等成为热门词。《东方杂志》刊载了大量文章进行论述<sup>[21]</sup>,《一九三二年中国农业恐慌底新姿态——丰收成灾》一文即指出,帝国主义底侵入一方面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加速度地商品化,使农村中所需要的日常用品愈加须仰给于充满着舶来品的市场,另一方面又破坏了农村中的家庭手工业<sup>[22]</sup>。粮食严重入超是“谷贱伤农”的重要原因,各国的经济恐慌及食粮生产过剩,乃利用中国免税进口而过量的倾销<sup>[23]</sup>。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钱俊瑞指出了外国农产品倾销下中国农产品的虚假过剩,中国农业基本的特征是在腐旧社会关系束缚之下的生产力的极度衰

落。可是当中国的经济组成世界经济的一员,中国的市场变成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国的生产尽管贫弱,只因为世界商品过剩的缘故,也会表现出一种虚幻的生产过剩。目下中国农产价格的往下直跌,便是这种幻象造成的结果<sup>[24]</sup>。

(二) 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视角探讨解决乡村问题方案

从现代化和全球化角度思考解决乡村问题的方案也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选择。

时人广泛认同工业化道路,虽然在农工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探讨中产生论战,在“立国之争”下产生“重农”与“重工”之不同,“复兴农村”和“发展都市”之区别,但争论的“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和“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两条道路殊途同归,一致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梁漱溟等乡建派坚持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认为“在农业技术前进的过程中,工业自相缘相引而俱来”<sup>[5]</sup><sup>[18]</sup>;吴景超、袁聘之等则认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认为工业的发展,能够“增加原料之需要,开辟农产品之销路,吸收农村中之失业人口,实为解救中国农村经济之良药”<sup>[25]</sup>。农工和城乡“相依相辅”“平衡发展”等提法逐渐得到认可,知识界进一步认为工业化和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张培刚提出“农业工业化”理念,卢作孚提出“乡村现代化”概念,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解更加深入。

借镜西洋是近代国人思考乡村问题的重要思想来源。一方面,引进农业技术、合作理论、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等西方理论,在国内广泛开展农业推广、合作社和乡村调查等。金陵大学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聘请洛夫、卜凯等学者到校任职,推广农作物改良等;合作理论、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社会调查等西方理论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并被社会各界接受和实践,并且进一步中国化。另一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舆论普遍认为,“救济农业最重要的方法”是“利用他国所经过的事实,所得的经验,来供给本国的参考,实为唯一良好的途径”<sup>[26]</sup>,国内各类报刊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三农”状况和对策的书籍和文章,予以借鉴。

### 三、立足于乡村调查来谋划建设思路

立足国情,以问题为导向是近代中国社会思

考乡村问题的特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状况尚未得到准确认知,时人力图通过调查来破解这一谜题。农学家顾复感叹:吾国各界人士对于农业,尚缺乏正当之见解也<sup>[27]</sup>;《东方杂志》于1927年指出,农民问题乃是中国的谜<sup>[17]</sup>;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人普遍感觉到,要复兴农村,必须先要对于农村的实况有一彻底地认识,然后才能分别缓急,对症下药<sup>[28]</sup>。

#### (一) 乡村调查形式多样

各高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及媒体掀起了乡村调查热潮,调查主体不一,形式也多种多样。

高校中以金陵大学农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等高校调查成果丰硕,卜凯指导学生在各省进行农村经济状况调查,出版《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研究机构中,陈翰笙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萧铮领导的地政学院等研究机构开展了系列调查,陈翰笙等人赴东北、无锡、河北等地开展大量调查,出版《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亩的差异:无锡22寸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等;地政学院招考大学毕业生进行土地问题研究,完成土地调查报告共178篇<sup>[29]</sup>。李景汉等乡村建设团体在实验区进行乡村调查,出版《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合作,对江苏、浙江、河南、陕西、广西和云南等六省农村进行调查;设立中央农业实验所,通过各地农情报告员的汇报,按期出版《农情报告》等。毛泽东也开展农村调查,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等。

还有媒体的调查征文和知识分子的返乡调查。如《大公报》希望全国读者提供乡村素材,“为普遍调查农民疾苦而宣扬之”<sup>[30]</sup>,随后大量发表农村调查文章;《东方杂志》征文“农民状况调查”,出版“农民状况调查”专号,并且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合作,设立“农村写实”专栏;《新中华》也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合作,开设“农村通讯”专栏,发表农村调查文章;《独立评论》则刊载了大量知识分子的返乡调查。

调查中不仅有全国农村经济普查和定期统计,还有区域重点调查,这种地域特点的重视也为准确了解乡村实情奠定基础。经济学家朱偁认

为,“各地农村经济没落之原因亦不尽同。如能实地调查,制成农村经济没落分区图,颇为有意义之工作”。他认为,农村经济破产,虽到处有此现象或趋势,实以长江流域及河淮之间为最烈。其他如广东广西各省,则病不在农村经济之没落,而在华侨海外经济之破产。至于长江流域各省,原因亦不尽同:江浙由于工业化及外国工业品之侵入,江北及其他各省,则由于水灾,或治安不宁<sup>[31]</sup>。

#### (二) 乡村调查内容各有侧重

社会各界主要从教育、生产力、生产关系三个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各有侧重。

定县调查侧重于教育问题,助力平民教育运动,通过实地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特别注意愚、穷、弱、私四种现象。随时整理搜集之材料,分析各种现象之构成要素,发现愚、穷、弱、私等现象之原因,试下相当的结论<sup>[32]</sup>。平民教育运动的乡村建设方案借此围绕“教育上谋建设”,主张“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卜凯和金陵大学等所做的各项调查侧重于农业技术问题,围绕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为政府乡村改良提供依据。如金陵大学农学院调查1931年江淮流域水灾后,得出的建议是“故切望能早日提倡合作事业,改进农村组织”<sup>[33]</sup>。卜凯调查七省田场后,提出适度规模农场,通过集约耕种等来改良农业生产,减轻地租等建议<sup>[28]</sup>。

毛泽东和陈翰笙等主持的各项调查侧重于土地所有制等社会问题,围绕生产关系,使用阶级分析方法,为中共提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理论与政策奠定基础。毛泽东说农村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sup>[34]</sup>,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认为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sup>[35]</sup>。

#### 四、致力农民主体的多方力量化解乡村问题

乡村由谁建设?农民、政府和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上应发挥各自重要作用,鼓励多方力量投身乡村建设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 (一) 农民主体和政府引导

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共识。社会学家杨开道认为乡村建设必得以中国农民为主人,以中国农村为主体<sup>[36]</sup>。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方粹农也指出,农村事业,农村问题的解决,中国今日问题的解决,也惟有农村青年能够负起使命来去干,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sup>[37]</sup>。

时人并没有过分依赖政府,虽然希望政府有相当的倡导与推动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sup>[38]</sup>,但政府的作用是引导和推动,而非包办,政府最贤明的政策,是间接地与这种运动以种种的方便,而助成其事,却不是政府包揽负责来作<sup>[39]</sup>。

乡村建设中政府引导和农民主体的关系如何协调,是时人关注的重点话题。梁漱溟对乡村建设力量的各自定位进行了思考,梁漱溟反思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两大难处”:“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和“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认为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既说社会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依靠政权”,因为“政府最代表那惰性、不进步性的”<sup>[5]368</sup>。农民的主体作用要得到发挥,乡村建设中,“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这不符合“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基础力量,而向前开展”<sup>[5]369-370</sup>。时人在具体措施上探讨着农民主体和政府主导的张力。如乡村合作运动上,论者皆认为“合作社本应由人民自动去组织,由下而上”<sup>[40]</sup>,但由于农民知识水平问题,一开始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指导与扶植,“俟至相当时期,在政府除监督奖励外,所有宣传指导组织等事务自应交付人民自行处理”<sup>[41]</sup>。

### (二) 归农运动

如何发挥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需要知识分子来指引。正如吴觉农所说:我国并大多数的农民,还是鼾睡着,深深地鼾睡着,没有指引的人们,没有领袖的人物,谁能使他们苏醒转来呢?<sup>[42]</sup>中国农民有“散漫而无组织”“智识幼稚”等缺点,并不能“独当一面干乡村建设的工作”,需要知识分子“回到乡村去,实地苦干”<sup>[43]</sup>。

随着城市人才虹吸效应的显现,乡村精英大量流失,此时,“到民间去”“归农运动”成为时髦话语。1933年,《申报》“读者顾问”栏中有大量关于“农村回得去吗”的讨论,读者反思“怎样回农村?”和“回农村去做什么?”<sup>[44]</sup>这

也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对自身责任的认知。所谓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是知识分子下乡的运动<sup>[45]</sup>。

梁漱溟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sup>[5]181</sup>。知识分子需要代表乡村的利益,代表农民的要求,让乡下人动起来跟着你走,发生大力量而转移大局<sup>[5]371</sup>。

知识分子“下乡”的重点任务是引导“农民自觉”,方法是“化农民先农民化”,达到农民“以自身的群力解除自身的困苦,解放自身的束缚”<sup>[46]</sup>。杨开道还做了具体规划,下乡“作乡村领袖”“作乡村教员”“研究农学”“经营农业”“从他方面扶助农业的发展救济农民”,而且认为“不必一定往乡村去或是去从事农业……凡能达到振兴农业和救济农民的,就可以说是这种归农运动”<sup>[47]</sup>。

## 五、近代中国社会关注与思考乡村问题的启示

近代以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乡村问题凸显,时人对乡村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三农”却在历史的演进中,日益彰显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回顾近代中国社会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有几点启示。

### (一) 跳出“三农”看“三农”

#### 1. 关注“三农”问题的角度要高

近代中国社会各界一直将乡村问题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乡村问题不仅仅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还关系到近代以来国人一直思考的中华民族复兴问题,这也是近代中国朝野上下广泛关注和思考乡村问题的重要原因。在当代中国,“三农”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不仅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治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sup>[48]</sup>,更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可以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只有具有了这样的高度意识,才能够增强责任感,以及使命意识,乡村振兴战略才能实施好。

## 2. 思考“三农”问题的视野要广

近代中国的乡村问题不仅仅呈现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问题,更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影响的结果。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前如何处理好农工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既是“三农”面临的难题,也是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所在。其中,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是关键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要在世界农业经济体系中找准定位,参与全球市场体系,更好地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和粮食安全相统一。只有从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发现“三农”发展的历史趋势和规律,才能够找准乡村振兴的定位和方向。

### (二) 立足于“三农”建设“三农”

#### 1. 立足于国情乡情振兴乡村

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怎样?虽然直到现在,仍存在“沉沦观”“发展观”等不同的看法,但时人对调查的重视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启示。随着农村发展变化日新月异,如何准确认知中国乡村,深化对各地乡村的理解,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依据,这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要全方位多角度来认知乡村,特别是注意乡村的区域差距和地区特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分类推进乡村发展”,不能千篇一律,要“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sup>[49]</sup>。

#### 2. 立足于农民为主体的多方力量振兴乡村

近代知识精英一直关注农民和政府乡村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虽然在实践中有“乡村不动”等困惑,但其对乡村建设力量的探讨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启迪。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也最了解自身,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既要倾听农民呼声,又要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幸福感。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上,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薄弱环节加强建设。鼓励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显身手,知识分子更要有担当,加入“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人才队伍中

来,通过返乡创业等多种形式助力乡村振兴。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10-18)[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2.
- [2] 赵旭东. 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 中国社会科学,2008(3):110.
- [3] 鲁迅. 祝福[J]. 东方杂志,1924,21(6):97.
- [4]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7.
- [5]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8-19,181,371,368-370.
- [6] 曲直生. 从乐观方面观察中国的农业及农村问题[N]. 益世报,1934-03-03(11).
- [7] 陈醉云. 复兴农村对策[J]. 东方杂志,1933,30(13):112.
- [8] 佚名. 《大地》编者语[J]. 东方杂志,1932,29(1):75.
- [9] 佚名. 编辑后记[J]. 中国经济,1933,1(4-5):1.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79.
- [11] 宋恩荣. 晏阳初全集:第1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294.
- [12] 廷黻. 跋燕先生的论文[J]. 独立评论,1933,74:8.
- [13] 董成勋. 中国农村复兴问题[M]. 上海:世界书局,1935:自序.
- [14] 方显廷. 中国经济研究[M]. 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163.
- [15] 孙本文. 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3册[M].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7.
- [16] 朱偰. 农村经济没落原因之分析及救济农民生计之对策[J]. 东方杂志,1935,32(1):(农)30.
- [17] 佚名. 农民问题与中国的将来[J]. 东方杂志,1927,24(16):3.
- [18]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208.
- [19] 杨开道. 农村问题[M]. 上海:世界书局,1932:14.
- [20] 何思源. 士大夫教育之恶果及教育改造途径:求生教育[J]. 东方杂志,1934,31(6):(教)16.
- [21] 蔡胜. 《东方杂志》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1918—1937)[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9:60-61.

- [22] 姜解生. 一九三二年中国农业恐慌底新姿态: 丰收成灾 [J]. 东方杂志, 1932, 29(7): 13.
- [23] 吴觉农. 我国今日之食粮问题 [J]. 东方杂志, 1932, 29(6): 7.
- [24] 钱俊瑞. 目前恐慌中中国农民的生活 [J]. 东方杂志, 1935, 32(1): (农)38.
- [25] 袁聘之. 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问题: 重农重工问题之探讨 [J]. 东方杂志, 1935, 32(16): 23.
- [26] 佚名. “世界论坛”导语 [J]. 东方杂志, 1929, 26(9): 49.
- [27] 顾复. 晚近农业诸问题 [J]. 东方杂志, 1919, 16(8): 129.
- [28] 卜凯. 中国农家经济 [M]. 张履鸞,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133, 193, 562.
- [29] 萧铮.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美国: 中文资料中心, 1977: 总序 2.
- [30] 张季鸾. 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 [N]. 大公报, 1931-05-22(01).
- [31] 朱偁. 田赋附加税之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 [J]. 东方杂志, 1933, 30(22): 9.
- [32] 李景汉.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3-14.
- [33]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概况 [M]. 南京: 金陵大学, 1936: 22.
- [34] 毛泽东. 毛泽东调查文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5-6.
- [35] 薛暮桥, 冯和法. 《中国农村》论文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410-411.
- [36] 杨开道. 我为什么参加农村工作 [J]. 民间, 1935, 2(1): 15.
- [37] 方粹农. 农村建设实施纪 [M]. 上海: 大华书局, 1935: 序.
- [38] 瞿菊农. 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 [J]. 民间, 1936, 3(1): 4.
- [39]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377.
- [40] 章元善. 政府提倡中之合作事业 [J]. 合作行政, 1936(4): 3.
- [41] 安徽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 [J]. 安徽农村合作, 1934(创刊号): 2.
- [42] 吴觉农. 中国的农民问题 [J]. 东方杂志, 1922, 19(16): 20.
- [43] 从乡村破产说到乡村建设 [J]. 乡村建设季刊, 1935(创刊号): 21.
- [44] 上海图书馆. 《申报》读者顾问集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2: 370.
- [45] 徐宝谦. 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基础 [J]. 乡村建设, 1936, 6(3): 2.
- [46] 瞿菊农. 乡村建设运动之过去与将来 [J]. 文化先锋, 1944, 3(6): 6.
- [47] 杨开道. 归农运动 [J]. 东方杂志, 1923, 20(14): 26.
- [48] 蔡胜. 以“三治融合”推进乡村治理 [N]. 安徽日报, 2020-03-04(06).
- [49]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21.

(责任编辑: 许敏)